

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文化界

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

马军 / 编纂

1937
1945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文化界
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

马军 / 编纂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
目录简编 / 马军编纂.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458-1145-2

I. ①全… II. ①马… III. ①汉学—研究—文献—专
题目录—汇编—日本—1937~1945 IV. ①Z88;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2561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封面设计	郦书径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
马 军 编纂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45-2/Z.36
定 价 98.00 元

本书献给我的母亲杜爱芸女士

序

杨国强

马军教授穷累年之力收罗爬梳,辑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一书,细密地勾勒了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的多方注视,以及中国人对来自日本的这种注视的再注视。由此留下的痕迹,便写照了中日之间在战争过程中独特的文化对流。

自19世纪中叶开始,近代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外力逼迫下的民族战争。与欧西列国之起端与通商传教而由动口到动手相比,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则从一开始便对中国抱定自觉而且明切的领土野心。于是而有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人杀琉球漂民”而出兵攻台,导致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台湾的对峙;1894年日本借韩事为引线而逼出来的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迨20世纪初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获得驻兵中国东北的权利,遂以这种进入了中国的武力为前导,不止不息地放手拓张,随后是1914年的日本出兵山东;1928年的日本再次出兵山东,以及沿此一脉,接踵而来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并由此为导因,最终激出了中国人前赴后继,以累累生命和鲜血支撑了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因此,从19世纪的后二十多年到20世纪的前四十多年,在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日本与中国相交往,都是以直露的暴力和隐现的暴力为表达方式的。而固结于其内里和深处的用意和指归,则都是在肢解中国与侵占中国。然则与欧西诸国之多用条约制度来限勒中国和牵引中国相比,这种直露的暴力与隐现的暴力,便一定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录上和近代中国的民族心灵中留下更多的伤痕。而就其时代内容而言,七十年间来自日本的暴力演变为民族战争,曾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前期两次直接地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然而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前期,日本又曾是对中国造成过极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因亲身经历了“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迭连冲击而识“变局”;并在回应变局的过程里促成了以后三十年里的取西法以图自强。有此既定的取向演化为既定的理路,则甲午年间中日战争的结局便被时人非常便捷地引用这种理路广作推演诠释,成为学西法的中国和学西法的日本之间的对比,而后是此前三十年中国人的借法图强,遂在战争失败而致割地赔款的事实反照之下,变得黯然失色和一无是处。甲午战争的结果,使60年代中国人初识的“变局”一变而为90年代士议中的“危局”,比之“变局”,“危局”显然内含着更多的逼扼和紧张。然而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胜利一旦被当时的论说独张一面之理,尽归于日本人学西法比中国人更加成功,则刚刚给中国带来了危局的日本,同时又异乎寻常地成了中国人深信可以效法的范式。甲午战争后三年,康有为上书皇帝,极富自信地说:“大抵

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戊戌变法的蓝图和戊戌变法的急迫，大都是从这种把日本当作楷模，而以三百年、三十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为期的一路推比里派生出来的。虽说后来戊戌变法不过历时百日即被摧折，但这一套道理却在人心里留了下来。因此，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中国人仍然会用这一套道理作评论判断，其时张謇致书袁世凯，便直白地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比之报刊鼓吹，这些见之于私函里的话显然更能真实地代表当日的一般思想。在这种简捷脱跳的推导里，日本人在一场战争中以武力致胜的事实，便非常轻易地等同于宪政的胜利了。而由此引伸，便是日本虽地居东亚，但以西法为尺度，似乎比本属西方的俄国已更加西方。当这种判断推导经时论的渲染而成为朝野之共识以后，经中国人别为解释而多了一重附加意义的日俄战争，便直接地促成了清末最后一段历史里的筹备立宪。

19世纪末期的日本因战胜中国而成为变法的榜样；20世纪初年的日本因战胜俄国而成为立宪的榜样。而后是筹备立宪的过程变成了中国的官员、士人、学生大批到日本去受学的过程，和日本的教习、兵头、顾问大批到中国来施教的过程。其间被视为一时之大政的兴办教育、编练新军、厘定官制、地方自治，以及财政、警政、司法、刑律的推陈出新等等，遂既以取法日本为捷径，又以取法日本为定势。当时的一则记载说，宪政编查馆“新定法律草案出自日本律师冈田之手。其引证历朝沿革，则取之薛允升稿本，法部郎中董康笔也”。这种同属一部草案，而前后两段之间的不相连属，说明被请来为中国立法律的日本人其实本不懂中国的历史。然则因此产生的“法律草案”，其源头显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宪政编查馆是清末中国提调新政的总汇之地，所以，引此以为实例，适可以直观地看到斯时日本影响中国曾经达到过的具体程度。而这个过程里形成的惯性既经潜积，又被带到民初中国，演为章士钊笔下所刻画的“迩来贩卖宪政者流，八九取之日本之成规而盲从之。其事之果于原理当否，国情当否，彼有和装之《法规大全》先入以为之主，不暇问也，以为日本所有者，吾必有之”。而与这种“成规”同时流入中国的，还有清末民初从日本移来的大量稗贩西国的学说和思潮，以及表述这些学说、思潮的日本词汇。其影响所及，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因变法而效日本，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因立宪而效日本。究其底里，变法和立宪，本旨都在走向近代化。然而以清末人的评说和民初人的评说相测度，则中国效日本所得到的，显然不是近代化，而是日本化。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别成一种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近代化必须是内在的，而日本化只能是外在的。因此，日本化虽然在清末民初弥漫一时，其实始终没有根须而不能深盘固结。而后是世路起伏，运会翻转，等到新文化运动洪波涌起，次第引入了蔡和森所说的“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之后，本以“日本之所有，吾必有之”为当然的一套道理，遂在新起的楷模与范式面前相形见绌而不能不光焰消褪。随后是自清末新政开始移进中国的种种日本物事，便在岁月的磨洗里日渐渐灭。其间能够留得下来并一路绵延的，则是当日取自日本的书报杂志而引入中国人语言文字里的各类词汇。这些词汇曾与中国人的文言杂揉于西潮灌入之际，由于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在迎入西学的过程中对应地新造出来的，因此，在中国人的文言不足以达意的时候，这些词汇既为西籍在中国的译述和传播充当了中介，又随西潮的播散侵濡而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中留了下来。作为西学的对应物和派生物，它们并没有太多

的日本性；而在文言行时之日，它们其实只能算是附庸。但当新文化运动后来居上地促成了白话代替文言之后，在文言因不能与新思潮相同一而被扫掉的地方，这些本属外来的词汇则因能够与新思潮相同一而得以保留，并因这一变迁造成的彼消此长而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部分，一面构成和影响了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一面又在同一个过程里日积而且日深地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两面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中的新陈代谢，以及种种新陈代谢由外来变为内在的非自然性。而与这种移入的词汇一同俱来的历史限度，则是100年来中国人在沟通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的过程里，用这种现代词汇及其特有的内涵去重读传统、重释传统和重估传统，常常会在历史的本相和本义面前力绌于两相隔阂而词不达意。而后是溢美和厚诬都成为很容易发生的事。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年中日之间的这种牵连纠葛，连同身在其间的那一代中国人的曲折心路虽在后浪逐前浪里先后变作陈迹，但其留下的余响却成为一种吸引力，使后来人一旦进入近代化这个题目，便会一次一次地去比较历史上的中国和日本，并以明治日本成功的近代化反衬晚清中国不成功的现代化。由此引出的反思，大半以进步主义为单一尺度，而扼腕于前人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单一的尺度作丈量，是注目于中日两国的可比性。然而在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日本之间，除了被选定的可比性之外，还有种种不可比性。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开言路群议立宪之时，有一段呈文说：“即日本同处亚东，其宪政亦非尽可仿行。犹忆昔年候补京堂吴汝纶至东洋考求学制，其文部大臣尝告以归国后不可尽仿日本制度，总宜自出心裁，求一对峙各国之法，以为定制”。然则日本的文部大臣以“不可尽仿日本制度”为忠告，其意中所及并特意提示的，正是中日之间的不可比性。当19世纪60年代，明治初期的日本由诸藩奉还版籍而汇成中央集权，有此以为起端，而后有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变法，以及在这种变法的节节开张里层层展布的维新之局。与此相比照，60年代的中国则刚刚从历时十多年的内战中走出来，而经此长期搅动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恰恰是中央集权的衰落。但若以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以及由此推衍而来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等机构的移用西法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实际起点，显见得中国人的近代化正是从地方开始的；而以这个过程中疆吏的主动性对映朝廷被动性，显见得中国人的近代化又是自下而上地萌动的。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事实，两者都反映了那个时候疆吏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自主程度。由此返视二十年前林则徐、耆英一班人目睹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徒有仿造之心而无仿造之力，则内战中形成的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正直接地促成了近代化在中国的由地方开始，并自下而上地萌动。其间的因果出自既成的历史，与日本相比，显然是一种不可比。但下移的国家权力同时是一种以分散为趋向的权力，因此，从地方开始的近代化，又不能不在地方的各自分界中成为缺乏一统而难以聚为整体的近代化。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所以处处捉襟见肘，大半病在畛域已分之后的地方自主，常常会沿着各自的畛域演为各是其是。积之日久，于是而有甲午中日战争里的“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一面事实所说明的是，曾经在起始之日助成过近代化的这种下移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之后又成了阻滞近代化的一种窒碍。两者连属于一体而互相矛盾有如死结，其间的因果同样出自既成的历史，与日本相比，显然也是一种不可比。梁启超后来说：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很早就实现了身份上的平等。但这种本属历史留下的益处和良性，却面对着“近世代议制度之

建立,实以阶级精神为中坚,既未能发明更优于代议制度之政制,而我以我绝无阶级根据之国向人效颦,势必以失败终了”。他所说的是不平等的贵族社会比一个平等社会更容易产生和形成以间接民主为本义的代议制度。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种理路里则被看成是英国政治制度随移民而带入的一种延伸。梁启超之外,在相近的时间里,章士钊也非常明白地举“苟国中夙无阶级,不重尊卑上下之分”则无从实行代议政治为通则,来说明中国学西法之难,可谓所见略同。他们都曾深信并践行过代议政治,又都曾目睹了代议政治在中国的一败涂地。显然这些话不仅出自学识,而且出自阅历。因此,后来人犹以本属等级社会的日本,一旦变法便能够立代议而行立宪为成功,来追问近代中国代议政治的不易成功,其实是在用道理上的应然淹没掉形成于历史之中的未必然,从而是更深层次上的一种以不可比为比。若引费正清总论历史中国影响近代中国的要素,而把疆域之广和人口之多列为其中的大端,则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的近代化之间便会有更多的不可比性。立此以为观照,则百年以来,中国人不断地对比自己和日本,关注点多半都在其可比,而不在其不可比。作为审量彼己,可比和不可比都是一种认识过程。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这个道理引申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一面来看自己一面,显见得知其可比是知,知其不可比也是知。因此,可比与不可比之间这种不对称,既说明了百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也说明了百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认知的犹有未足。

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对中国的审视观察则以周密细致为功夫。由于这种审视观察常与彼邦的大陆政策相联系,因此入此一行的,不仅有以文化为专业的学人,而且有出自政府、军队、商界、报馆和民间社团的各色人等,其中不少属于无以归类的浪人。这个过程从19世纪后期开始,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著述,也留下了大量的旅行日记、见闻随笔、通信、专报、地图,以及多种卷帙浩繁的调查资料汇集。由此积聚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见闻之知和查考之知,其涉类之广泛,记述之详备,至今犹使人过目之后印象深刻。然而20世纪初年,章太炎在日本作讲演,说是“日本人对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的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相比而言,则欧洲人还“没有这种荒谬”。又说中国的读书人向来以《纲鉴易知录》为浅陋。“但到这边(日本)来听的历史,一部《支那通史》,翻来覆去,缭绕了许多,比《易知录》更浅陋”。至30年代,则痛诋近日“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疵”,然后引日本之治中国史者为同类而归之于伙。以章太炎为人之崖岸自高和为学之力尚通达,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断断于奚落彼时讲中国学问的日本人,其意中所不能忍的显然是日本人常会因不能从整体上贯通地识得中国的内在本相而错解,又会因不能从文化上切入地感知中国人的精神本根而臆断。虽说当日的日本汉学界自有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直喜这样被陈寅恪称作“东国儒英”的人物,不能太过简略地一并归入章太炎这种判断的统括之下,但章太炎以学人评学术,其指论所及,应当不会仅仅是个别和少数。然则以这种在整体贯通和内在一面对中国认知的不足,对比其调查所得和学术著述中比比而见的局部之详备深入和细节之周密准确,两者所形成的同样是一种不对称。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的前期,中日之间的冲突弥久弥烈,而主动一面始终在日本。溯其源头,这种以中国为对手的扩张之能够不止不息,支撑和维持日本一方极度自信的,不会没有他们对于中国自以为是的认知。这个过程为中国

人带来的是深重的苦难,而为日本人带来的却是最终的失败和彻底的失败。因此,这个过程又显示了这种不相对称的认知一旦成为引导,曾经怎么样使人跌得鼻青眼肿。而后是战争的由来和归宿成为一种调教,从而战争的由来和归宿会引发反思,遂使 20 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不能不变,其间以学术为本位的汉学尤能精进累积,蔚蔚然成一时之大观。然而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中日之间的国家交往时起时落,犹在不能以稳定立常态之中。由于不能稳定,遂常常会由政治牵入历史,也常常会由历史牵入政治,而日本对于这种政治和历史的国家论说所表现出来的因时而异和前后相悖,以及因此翻动而被搅起的旧日的回声,又以其单面独断显示了对昨日中国的认知依旧不足,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尤其不足。两者都说明了认识过程走出历史惯性之难。

马军教授辑录的这本《文献目录简编》,汇集了一个特定时代里日本人注视中国之际所留下的广度痕迹和深度痕迹,而作为一种出自历史的实录,又成为今天中国人通观日本以期真知日本的实证依据。以中日两国百年以来的不能不相互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不能不仍然在继续之中的事实为背景,则他所提供的资料一定能够在汇入其中,并因汇入其中而成就和彰显自身的价值。在前后承接的学术探寻里,这是一种能够长久留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军有志于“一人劳而众人便捷”,表达的正是学人的大胸怀。

目 录

序	杨国强	1
编纂缘由		1
凡例		1
1937 年(7 月 7 日起)		7
1938 年		15
1939 年		33
1940 年		58
1941 年		84
1942 年		116
1943 年		145
1944 年		183
1945 年(截至 9 月 2 日)		211
人名索引		217
主要参考工具书		267
本书编纂者“海外汉学史”方面成果目录		271
后记		275

编纂缘由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译介,呈现出方兴未艾、热潮迭起之势,具体则为相关机构陆续设立,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国际交流日益活跃,各类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的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从事此类研究的诸多学人,学术史的观念相对淡薄,文献检索能力普遍不足,以致对本国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由此,既有损于学术规范,也大大降低了新作的价值。须知,有关该主题的学术工作,早在民国时期乃至清代便已开始,而且数量颇多、业绩不菲。对此,今人既不应漠然视之,也绝不可回避了事。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日本也历来是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大国,其严谨细密、视角独特的成果,一直是中国人认识本国历史文化问题的重要参照。1949 年以前,中国人士便已发表了数千上万计的反映日本“中国研究”的专著、译著、论文和文章等,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在今人严绍璁、李庆、钱婉约等教授有关日本汉学史的标志性著作中,“先驱者们”的译介成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借鉴、重视和总结,甚至是只字未提。有鉴于此,本人早在 2005 年就开始着手编纂一部大型目录书,旨在较为全面地反映 1949 年前中国文化界人士用中文研究、翻译、评论、介绍、辑校日本“中国研究”的概况和过程,具体来说,拟取材于文献实物、已版索引和网络资源,三者结合地将有关文献尽可能地涵盖进去,这样既可以填补学界的一项空白,也是颇为有益的专题整理。

众所周知,治学必先治目录,本目录除了具有检索功能外,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为全面研究“1949 年前中国文化界人士研译日本中国研究”这一课题,乃至编纂各种专题的资料集,提供了先期的准备工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致可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1949 年以前国人的研译工作提供了了解日本早期中国研究的一扇窗户。尽管当时对日本汉学界重要人物、著作论文、系科建设、刊物设置、图书收藏等状况的翻译和介绍尚不够系统完整,但毕竟为中国学术界乃至一般国人贡献了一条管窥的捷径。不用说旧时中日两国信息交流尚不够便捷,即便是今天,对许多国内学者来说,有关早期日本汉学的材料仍不易找寻。比较之下,本国文字的书籍、期刊,哪怕是旧刊旧籍,却易于取得,而且在阅读上没有语言障碍。

其二,该研译工作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种交融,其本身也是值得探究的对象。日本的中国学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属于日本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的研译,则又属于中国学术的范畴。由此,它具有文化传播的交叉性质,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一种回流,亦即“中学东渐之回传”。研译过程中的成绩和疏漏,以及若干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被译介者及其成果是否有代表性、译介水准、译者状况、双方学者交往、发

表刊物等等,都有待系统、深入的探析。

其三,该研译工作为当今国内炽热的“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历史有着延续性,学术发展也有着继承性。近年来,环顾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许多人对1979年以前,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研译成果所知甚少,也不愿意去深入了解,以致闭门造车,蒙头而作,导致了許多重复劳动,而这些重复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又往往今不如昔。前人的成果是后人治学的灯塔和坐标,其经验、教训是后人的宝贵财富,对此应予以足够的尊重和借鉴,以免进入误区。

其四,该研译工作还能够促进今天国内“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均衡发展。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其发展有着连续性和内在规律。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之中国研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现当代,对早期则关注较少。就学术史的脉络而言,这种重近轻远、畸形发展的现状应予改善。

历经多年的努力,本目录的编纂、整理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但全部(约120万字)出版则仍需时日。而今年(201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人故截取全面抗战时期(即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的部分,先行推出,以飨学界。

翻阅本目录可以发现,即便是中日两大民族激烈交战的年代,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双边文化交流……

凡 例

一、收录范围——本目录收录了约 2000 条中国人士研究、翻译、评论、介绍和辑校日本“中国研究”的文献条目,该文献应为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首次用中文出版、刊印的专著、译著、论文、文章或译文等。须注意的是,未正式发表的手稿不在其列;日本人士自行用汉文书写或自行日译汉的成果,亦不在其列。

二、条目要素——其一,文献分类:1、书籍类(含专著、译著、论文集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2、期刊发文类(含论文、文章、译文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期刊地或主办单位、期刊名、卷期(号)、刊发时间;3、报纸发文类(含论文、文章、译文等)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报纸主办地、报纸名、刊发时间、版次;4、论文集内论文类条目,收有文献名、责任者、论文集责任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其二,注释:必要时,在文献名后加说明性的页下注;若文献是书籍类,则尽力在注释中列出详目。其三,有关符号:“/”是某出版单位所出之同一著作(或收录论文、文章的书籍及论文集)不同版次的间隔号。“//”是收录了同一论文或文章的同一书籍(或论文集)分属不同出版单位的间隔号。

三、单元——每个单元由一项或多项条目组成,第一项为首刊首发,其余为重刊重印,或同书异译、同文异译,或全译选译摘译等。为了便于比对、甄别,1945 年 9 月以后的重译、重刊、重印、重版状况亦尽可能列入其中。

四、单元号——每个单元有一个单元号,共 5 位,前 2 位代表首刊年份,后 3 位代表在该年份内的排序。例如 39 034,39 指 1939 年,034 指 1939 年里的第 34 个单元;又如 42 102,42 指 1942 年,102 指 1942 年里的第 102 个单元。

五、排序规则——各单元之间,以其内第一项刊发时间(即首发时间)先后排序;单元内部各项,亦以发表先后为序。发表时间精确者排在时间模糊者之前,例如 1941 年 8 月 15 日排在 1941 年 8 月之前,1941 年 8 月又排在 1941 年之前。

六、数字——除条目正标题遵照原样外,其余部分尽量采用阿拉伯数字。

七、索引——为便于检索,目录之后附有“人名索引”。人名排序按照汉语拼音,若首字相同,则依次字,以此类推。人名之下数字为单元号。

八、附有“主要参考工具书”——书名排序以出版先后为序。

目 录

序	杨国强	1
编纂缘由		1
凡例		1
1937 年(7 月 7 日起)		7
1938 年		15
1939 年		33
1940 年		58
1941 年		84
1942 年		116
1943 年		145
1944 年		183
1945 年(截至 9 月 2 日)		211
人名索引		217
主要参考工具书		267
本书编纂者“海外汉学史”方面成果目录		271
后记		275

1937年（7月7日起）

37001

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

志 《解放》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7日。

37002

日人眼中的中英关系

原胜 《月报》第1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37003

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译自日文《东亚杂志》第10卷第3、4期）

胡小采译 《国民经济建设》第2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37004

中国大运河沿革考（译自日本《地理教育》第7卷第6号，第8卷第1、2号）

西山荣久著 祁蕴璞译 《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年7月16日。

37005

中国茶业史研究（译自日本《支那经济史》第3篇）

田中忠夫著 何健民译 《时事类编》第5卷第14期，1937年7月16日。

37006

日本在华特务机关分布情况

上海《周报》创刊号，1937年7月17日。

37007

论文摘要：《北魏之僧祇户与佛图户》（冢本善隆著，周乾涖译，《食货》第5卷第12期，1937年6月16日）

让 《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3卷第10期，1937年7月20日。

37008

论文摘要：《唐代长安文化与契丹文化》（神尾式春著，温槐三译，《西北论衡》第5卷第6期，1937年6月15日）

超 《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3卷第10期，1937年7月20日。

37009

中国古代社会论

早川二郎著 张锡纶译 天津《益世报·食货（32、33）》1937年7月20日，第12版；7月27日，第12版。

（第六章）古代中国社会论

载早川二郎著，谢艾群、杨慕冯译《古代社会史》，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5月初版。/1943年7月第3版。/1946年4月第4版。